

## 祥发源：中国近代物流的先驱<sup>①</sup>

徐俊嵩

摘要：祥发源是清末广东邓氏设立的报关行，主要经营货物的揽载、纳税及报关业务，其揽载商品包括茶叶、绸缎、布匹、煤铁等。祥发源设立的时间略晚于轮船招商局，其分号遍及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九江等地。为业务发展需要，祥发源的经理邓瑞人在1906年成立了上海宜安保险公司，使它得以摆脱高昂的保险费用以提升竞争力。

关键词：近代 祥发源 报关行 商号

在明清经济史研究中，我们时常会与一些商号、字号不期而遇，但除了粗知其经营业务和地点外，对于其他相关事实则概莫能知。囿于历史时期信息的相对闭塞以及专利意识的缺位，同名、同音商号的大量涌现，加之总号与分号、连号之间的复杂关系，每每给研究者增添不少困惑。笔者以为，加强对商号、字号的研究，厘清其相互关系与发展脉络，对明清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大有裨益。赖惠敏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旅蒙商号的研究，为商号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sup>②</sup>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尝试对近代商号“祥发源”的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 一、问题的提出

祥发源是活跃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个商号。关于祥发源的性质，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史若民先生依据《行商遗要》中对于祥发源的两处记载，认为它

<sup>①</sup> 本文是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课题“近代晋商谱传资料整理研究”（课题编号：JSKT2019.016）的阶段性成果。徐俊嵩，历史学博士，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讲师。

<sup>②</sup> 参见赖惠敏教授的系列论文，如《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史学集刊》2012年第6期；《清代库伦商卓特巴衙门与商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4期；《清代库伦的买卖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清代北京的旅蒙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等。



是山西茶庄字号，且有北京丰台和汉口两处分庄。<sup>①</sup> 赖惠敏教授根据光绪年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指出清末的祥发源是张家口茶叶的商总，是祥发永的一个分号，而祥发永则是汾阳商人王庭荣在张家口创办的账局。<sup>②</sup> 依据赖教授的研究，祥发源应该是汾阳王氏设在张家口的茶庄字号。此外，邓世昌的重侄孙邓敏扬在《邓氏家族谱》中称邓世昌的父亲邓焕庄，“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sup>③</sup>

以上观点都认为祥发源是茶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祥发源是广东邓氏所设，前二位学者认为祥发源是山西商人所设。据笔者研究发现，山西商人和广东邓氏都曾设有祥发源商号，但两者性质不同。笔者所能搜集的资料中以邓氏祥发源为主，张家口茶叶总商的祥发源资料甚少，在民国五年（1916）山西孝义县的《建筑中阳楼并永安市场记》碑文中，捐大洋一元以上的商号中有祥发永号，捐白银二两以上的商号中则有祥发源号。<sup>④</sup> 既然参与了孝义县的捐款，这两个商号即便不是孝义县的商号，也应是山西的商号。此处的祥发源与赖教授提及的张家口祥发源应是同一字号。

以下笔者将重点对邓氏祥发源进行相关考察，拟探讨的问题主要有：邓氏祥发源究竟是何人所设，到底是不是茶庄？它有哪些分号，主要经营何种业务？

## 二、商号财东与性质

按上文所述，邓敏扬认为邓焕庄开设的祥发源是茶庄，在广州、天津、上海、汉口、香港和秦皇岛等地设有分庄。但据邓世昌的侄孙邓权民回忆，邓焕庄在上海“经营商品报关生意”<sup>⑤</sup>。按辈分来说，邓权民距离邓焕庄的时代更近些，其说法应该较邓敏扬更为可信。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邓焕庄，字端甫，清末爱国将领邓世昌之父。<sup>⑥</sup> 邓焕庄的相关资料较为有限，仅《申报》（上海版）有些许记载，但除了几则捐款信息外，剩下的则是关于他的经济纠纷案件。根据《申报》的记载，邓氏是同孚洋行的买办，因欠债未还而被债主广祥合告上公堂，并要求邓的担保人魏肯堂归还欠款，双方因此还在广肇公所核对账目。<sup>⑦</sup> 既然当过买办，熟悉英文和商业条款，那么邓焕庄开设

①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第135页。

② 赖惠敏《清代库伦的买卖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22页。

③ 邓敏扬《气壮山河：纪念民族英雄邓世昌殉国100周年》，1994，第39页。

④ 李金山《孝义文化全书第3辑 明清晋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4、6页。

⑤ 陈晓平《邓世昌家世新说：父亲当买办 家族开揽载行》，《澎湃新闻》2016年1月21日。

⑥ 关于邓世昌与邓端甫的关系，陈晓平在澎湃新闻中曾有过相关考证。参见陈晓平《邓世昌家世新说：父亲当买办 家族开揽载行》，《澎湃新闻》2016年1月21日。

⑦ 广肇公所是广东省广州、肇庆两府所辖的龙门、增城、东莞、深圳、新会、清远、台山、肇庆、高安、四会、广宁等县旅沪同乡组织。见《累及保人》，《申报》（上海版）第1052号，1875年9月30日。

报关行可以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看来，邓权民的回忆似乎更为可信。

何为报关行？它是随着洋关的开办而产生的。鸦片战争后，海关逐渐为外国人窃据，所用文件单证多用英文，手续烦琐，商人办理甚感困难；海关也因商号日多且商号人员缺乏知识，解释说明起来十分麻烦，于是便产生报关行这一中间行业。<sup>①</sup> 戴一峰认为晚清报关行是在新式海关建立后，因应减少通关交易成本的市场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介入通关货主和海关之间的中介经济组织。<sup>②</sup> 报关行主要从事代客办理通关手续，装卸货物，从而获取一定佣金。由于当时海关报关手续繁杂，报关行趁机向客商收取高额的手续费<sup>③</sup>，因而其利润十分可观。民国年间的调查显示，大报关行的收入包括约 15%—20% 的轮船水脚回扣，约 5% 的货主佣金；小报关行则需依托大报关行转报，水脚回扣归大报关行所得。<sup>④</sup>

在宣统元年的《上海指南》一书中，祥发源被列入报关行类下，地址在英租界江西路 94 号，祥发源昌记则位于四川路腾凤里 A81 号。<sup>⑤</sup> 报关行是开埠后新诞生的商业机构，尤以上海地区为多。1909 年上海的报关行已有 37 家；第二年，上海的大小报关行就猛增到 88 家之多，集中在江西路、永安街、豆市街、公馆马路一带。<sup>⑥</sup> 上海祥发源正好坐落在江西路，属于报关行集中区。值得注意的是，仅一年的时间，上海报关行的数目就增长了 1 倍多，足见该行业利润之大，方引得商界精英趋之若鹜。

在民国年间的上海商业习惯调查中，祥发源位于四川路桥块，是合资的报关行同业组织，其经理人为邓瑞人。<sup>⑦</sup> 邓瑞人即邓炽昌，瑞人为其号，是清末海军将领邓世昌之族弟。<sup>⑧</sup> 邓瑞人是民国年间的金融巨子和社会名流，不仅开设银行，经营保险、食品等业务，还是十九路军的财政官员，与蔡廷锴私交颇厚。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断定祥发源是广东邓氏开设，创自邓焕庄，后由其侄邓瑞人继任经理。在两则上海的史料中，祥发源都是报关行，且其地址都有上海的四川路，可见祥发源为报关行无疑。宣统元年（1909），上海不仅有祥发源，还有祥发源昌记。后者沿用祥发源的名号，可能是其下属机构，也可能是祥发源内

①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第 181 页。

② 戴一峰《制度变迁与企业发展：近代报关行初探》，载《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 159 页

③ 上海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辞海·经济分册》，上海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第 372 页。

④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法政卷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 592 页。

⑤ 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第 140、215 页。

⑥ 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 129 页。

⑦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法政卷上》，第 594 页。

⑧ 邓炽昌《次韵邓炽昌瑞人六十自述诗》，收入赵式铭《赵式铭诗选注》，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 64—65 页。文中注释，邓炽昌为邓世昌之弟，但邓世昌兄弟中无此人，实际上是族弟。



部斗争分化出的新商号。祥发源昌记最早出现在1910年4月26日的《申报》中，当日报纸的《南洋劝业会各埠转运处广告》中有“祥发源昌记林子贞”的记载。<sup>①</sup>

那么祥发源究竟创设于何时？根据邓世昌的三个儿子邓浩洪、浩祥、浩乾为其父所作讣闻记载，邓世昌的祖父与父亲都于光绪十年（1884）去世<sup>②</sup>，故祥发源的创设时间肯定远早于此。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三日，李鸿章给浙江候补道朱云甫的信中称，“汉口茶箱由轮船承运一项，昨据江汉关道来禀，已由众商公举祥发源承充商总”<sup>③</sup>。李氏之信说明，祥发源在1874年已经是汉口各商公举的轮船承运茶箱的商总。此时的祥发源已是汉口商界翘楚，肯定不是草创之时，因而祥发源的创立应该早于1874年，估计与轮船招商局差不多同时兴起。

### 三、祥发源各号及经营业务

祥发源作为清末重要的报关行之一，与轮船招商局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近代以来，运河的航运价值逐渐被长江水运及海运所取代，尤其是轮船引进以后，海运的地位愈发重要。除了最初在上海设立总号外，祥发源还在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设立分号，如天津、汉口、广州、九江等地。祥发源最初的业务主要是揽载茶叶和绸布，后来也兼营煤铁运载并代理保险业务。

#### （一）祥发源各号

##### 1. 上海祥发源

早在明代，广东商人便已与上海建立了贸易往来。清代时，闽粤商人从广州装载大量洋广货至上海贩卖，至道光中叶，上海地方官员称，“悉上海号称小广东，洋货聚集，有洋商四家半”<sup>④</sup>。

作为最早对外通商的港口城市之一，上海是祥发源的发源地和总号所在地，邓焕庄大约在1872年左右在此设立了第一个祥发源。至宣统初年，上海已有祥发源和祥发源昌记两个商号，其中可能涉及祥发源内部股权的变动与业务纠纷。甲午中日战争中，邓世昌以身殉国，社会各界纷纷赠送挽联、挽幛以缅怀其英魂。其中，上海、天津、汉口三地祥发源捐赠的挽幛依次为“虎帐风寒”“声威宛在”和“虎遗鹿耳”。<sup>⑤</sup>这三处祥发源都向邓家捐赠了挽幛，除了钦佩邓世昌

<sup>①</sup> 《南洋劝业会各埠转运处广告》，《申报》（上海版），1910年4月26日。

<sup>②</sup>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族英雄邓世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第25页。

<sup>③</sup>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三一·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29页。

<sup>④</sup> 王汝润、陈左高《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07—208页。

<sup>⑤</sup>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族英雄邓世昌》，第99页。

的为人外，恐怕与他们之间渊源颇深也不无关系。

上海祥发源最初以邓焕庄为经理，在他去世后则由其侄邓瑞人接管报关行业务。根据前文邓焕庄的经济纠纷案，可知祥发源在其任上发展得并不理想，已经出现一些危机。直到邓瑞人担任经理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天赋不断扩宽业务，实行多种经营，才最终带领祥发源走向兴旺繁荣。

## 2. 天津祥发源

天津开埠后，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商业和港口城市、北方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祥发源在北方的经营重地。为商户揽载货物是祥发源最基本的业务，平遥日升昌写给天津分号的信中，就提到让祥发源代发货物<sup>①</sup>，可见日升昌天津分号与祥发源之间存在业务往来。

除了与票号之间的业务，祥发源与近代银行之间也有一定的业务往来。《盛宣怀档案》中记有北京银行借贷给天津各商户的资金情况，其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十五日，该银行借给坐落于福神街的祥发源行平化宝五千两，七月十五日到期，每周九厘行息。<sup>②</sup> 报关行需要为商户代缴各项费用，流动资金对维系其正常运营至关重要，所以祥发源会向银行进行短期贷款以充实储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天津绸布商从上海运货至天津，中途被日本海军截留，扣留一年多仍音信全无。无奈之下，商人只得求助北洋大臣袁世凯及津海关道。兹节录部分档案：

据津海关道详称：绸缎洋布商人敦庆隆纪锦斋、庆丰成张幼之、和泰益高辅臣、元隆号张俊卿、独慎玉杨世华、永全吉霍怀珠、久福源何冀卿等具禀并来署供称：商等均在天津开张绸缎洋货生理，上海皆设分庄。向来在沪购货，即交揽载客货之祥发源行代运。该行执事邓鸣谦写祥发元（源）起货单交商等收执，俟货到凭单领取。历年如此办法，并无舛错。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商等分庄在沪购妥绸布等货，交祥发源代运秦王（皇）岛、天津，伊即分装西平、北平两轮船，开至中途，被日本海军牵去，将商等货物扣留不还。商等赶向祥发源索货，该行执事邓鸣谦随往战地，与日本军官理论数次，未见发还。邓鸣谦与商等来信说：前项货物，日本尚未变卖，将来

<sup>①</sup> 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第872页。

<sup>②</sup> 陈旭麓、顾廷龙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40—141页。



必能发还。奈商等候至年余，尚未头绪，商等存有祥发源起货单为凭，委无违禁之货，亦非转运战地。商等愿具甘结等语。<sup>①</sup>

由此资料可知：这些绸缎洋布商人主要在天津设店经营，在上海设有分庄。他们在上海购货，再交由祥发源代运至天津。商人的供词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祥发源提供了诸多信息。首先，上海、天津都设有祥发源商号，且绸布商人与祥发源之间已经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其次，祥发源的运作方式已与今日的物流业已无甚差异，即由商号经理人写起货单给商人——商号安排轮船装运——商人凭单取货。最后，邓鸣谦是天津祥发源的经理人。

天津祥发源成立于何时尚不可考，应晚于上海祥发源。民国元年（1912）的《创建广东会馆碑记》共六通碑刻，第一通详载了广东天津会馆的建造过程，其余五通为商人、商号捐助名录。<sup>②</sup>下表是依据五通捐款碑整理所得，参见：

表1 创建广东会馆各商人商号捐款情况一览表

捐银数（两）	人数（个）	捐银数（两）	人数（个）	捐洋数（元）	人数（个）	捐洋数（元）	人数（个）
6000	1	99—100	48	1500	1	13—15	26
3500—4000	3	60—72	7	1000	1	10.1—12	8
2840—3000	5	50	14	500	1	9.5—10	110
1200—2000	11	25—35	9	200—210	3	7—9	105
950—1000	9	20	19	120—160	8	5—6.9	296
640—800	3	13—15	11	100	16	4—4.9	182
550—600	8	10	38	60—80	5	3.1—3.9	122
497—500	7	7—9	6	50	31	2—2.9	60
210—300	19	5	30	35—40	10	1	144
190—200	27	3—4	10	30	33	0.5—0.9	33
150	6	1—2	15	25—28	6	合捐 5.75 <sup>①</sup>	57
				20—22	56	合捐 60.35 <sup>②</sup>	不详
合计	99		207		171		1143 +
总人数					1620 +		

注：①此处 5.75 元为 56 人合捐。

②因为合捐 60.35 元的人数不详，所以此处人数应大于 1143 人。

① 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1990，第 223—224 页。

② 《创建广东会馆碑记》，收入许檀编《清代河南、山东等省商人会馆碑刻资料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第 401—412 页。



据碑刻记载，天津广东会馆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七日，落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四日，共花费白银9万两，会馆的花费可谓巨大。民国元年（1912）的捐款涉及在津的广东籍商人及商号，捐款分捐银和捐洋两种。其中，邓鸣谦、祥发源号都列于倡建值理之列，且邓鸣谦捐款1000两、祥发源捐款500两，属于捐款较多者。<sup>①</sup>

由表1可知，参与捐款的广东籍商人、商号超过1600个。其中，捐银者306个，捐款达88000多两；捐洋者超过1314个，捐款近16000元。在捐银的商人、商号中，邓鸣谦捐款1000两，位于第21位，位居榜首的则是捐款6000两的怡和洋行大买办梁炎卿；各商号中，除常丰盛公帮和北京广东会馆集体捐资外，祥发源捐银500两，仅次于宏远堂和裕记，与德泰等六商号并列第3位。<sup>②</sup>在参与捐款的1600多个商人、商号中，邓鸣谦和祥发源捐款的排名与其财力及其在津地位是相对应的，故可以推测邓氏在天津商界有一定地位，而其毋庸置疑也是天津的大商号。

邓鸣谦与祥发源都名列天津广东会馆的碑记中，且在会馆建设中捐款颇多，故这一人一商号都是广东籍。另据《民国上海县续志》载，广东宪民学堂是宣统二年（1910）正月由广东人曹咏南、邓鸣谦、陈止澜集捐创办。<sup>③</sup>可见，邓鸣谦是广东籍商人无疑。邓鸣谦姓邓氏，广东人，在上海生活过，且又是天津祥发源的经理，应该并非单纯的巧合，他应该与邓焕庄也有亲属关系。这些信息让我们更加确信，祥发源是广东邓氏创立的家族企业。

### 3. 汉口祥发源

汉口是长江沿线的水运要衢，被称为“天下四聚”之一，是明清以来重要的商业城市，也是近代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汉口祥发源设立较早，初期业务主要是揽载西帮各类茶叶至天津、北京。《行商遗要》中记载了光绪元年（1875）汉口走轮船的一些规例，其中红茶由汉口运至通州，乘坐招商局的轮船，运费为2.75两；若乘坐祥发源的轮船，其运费为2.8两。<sup>④</sup>从《汉口装轮船例底》来看，光绪初年，招商局和祥发源都承担西帮茶叶的运载，此后则多由祥发源负责揽载。<sup>⑤</sup>光绪九年（1883），时任招商局汉口分局经理的唐德熙在给唐廷枢的信中道出了个中缘由——“总局来信皆谓西客反复无常，嘱勿沾手，恐怕吃亏，嘱仍

① 《创建广东会馆碑记》，第402—403页。

② 同上书，第402—403页。

③ 吴馨编《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中·初等小学堂》，民国七年铅印本。

④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21页。

⑤ 同上书，第521—523页。



由祥发源统运云云”<sup>①</sup>。可以看出，祥发源之所以能够牢牢掌握西茶帮业务，主要因为招商局上层不信任西商，担心与其贸易会吃亏。这也间接反映了清末西商诚信崩塌，已然失信于招商局等机构。

茶叶的运输在清末无疑是项利藪，招商局上层的决策势必会使招商局蒙受极大损失。这一决定自然引起了招商局中部分人士的非议，唐德熙即其中之一。他在致唐廷枢的信中义愤呈词道“若然，汉局当时依示行事，把西茶运通茶箱生意推出不理，则一失而不可复得，[试]问此事是有益于公乎？是损于公乎？……假使尽归祥发源经手，有何增益于局乎？”<sup>②</sup>唐德熙清醒地看到西茶贸易的重要性，为了招商局的利益，他抵制了总局的命令，没有全盘让出西茶贸易。虽然唐氏践行了正确的决策，但后来他却因为没有按指示行事而受到总局的排挤，这使得他心中既委屈又愤懑不平。

汉口祥发源的经理人是刘星桥，但我们无法确认在他之前和之后有没有其他经理人。1917年北京《晨钟报》报道了轰动汉口的假狐仙案，该案发生在汉口长胜街刘宅中，宅主刘星桥正是祥发源报关行执事略。<sup>③</sup>

#### 4. 广州祥发源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中收录了广西银行总任范椿年等人的信稿，其中涉及委托祥发源运货之事。书中原文为“兹托祥发源报关，行运粤转梧，黄酒四十坛、香片茶九箱、红茶七箱，至日照收”。<sup>④</sup>因为不知道祥发源是报关行，所以史若民先生误将“报关”与“行”断开，以致加大了原文的理解难度。其实此处是范椿年通过祥发源报关行运输黄酒、茶叶等货，先取道广东，再转运至梧州。可以推测，祥发源在广东应该设有分号，否则范椿年也不会委托它在广东和梧州境内运货，而分号的地点应是前文邓若民先生所说的广州。

#### 5. 九江祥发源

九江祥发源的资料较少，其创立时间与执事姓名皆不可知。光绪五年（1879），《上海经募直豫秦晋赈捐征信录》中详载了各处捐款明细，其中祥发源向上海助赈公所捐英洋4元，九江祥发元、九江祥发源向上海果育堂捐英洋20元。<sup>⑤</sup>此处的祥发元不知与祥发源是何关系，是其分号抑或记载舛误，俱不可知。

<sup>①</sup> 刘志强编著《徐润年谱长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6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9页。

<sup>③</sup> 汪寿松等选编《老新闻百年老新闻系列丛书：民国旧事卷1916—1919》，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23—124页。

<sup>④</sup>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665页。

<sup>⑤</sup> 李文海，夏明方等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5300、5311页。

## （二）主要业务

资金链的流通是报关行业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因而民国初年上海的报关行中，基本都是合资经营。<sup>①</sup> 作为报关行，祥发源主要为商人提供货物揽载服务，包括轮船运输货物、沿途关卡代纳厘金等各项税收。祥发源的具体业务主要包括绸布、茶叶、煤铁等商品的运输以及货物代理保险等业务，以下将从这几方面逐一展开。

### 1. 绸布

绸布是祥发源运载的重要商品之一。“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上海作为中国绸布的重要生产地，也是绸布的重要集散地，前述天津绸布商人被日本海军劫持货物一案中，商人们正是在上海采买绸布后托祥发源运载至秦皇岛、天津等地的。

祥发源在运载货物过程中也会遇到遗失单据的情况。为了防止他人拾得单据而出现冒领货物的现象，祥发源通常会在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通过声明遗失单据作废的方法避免损失。1918年11月14日，上海祥发源就曾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遗失派司》的声明，其文如下：

兹有怡和纱厂七月念五日付税第 11184EWO 唛派司一张，  
计土粗布念件四百匹，报过十四件，尚余六件。该派司在海关  
遗失，已向海关声明挂失作废。

特此布告

祥发源白

此处的派司（Passport）是一种纸质通行证，记载了货物名目及纳税明细。从祥发源的这则声明可以看出，此次揽载的货物是怡和纱厂的土粗布 20 件 400 匹，其中 14 件已报税，尚余 6 件未曾报税。

### 2. 茶叶

茶叶作为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中国近代航运业产生之前其贩运主要依靠人畜力，水陆运输的周期都较长，而且花费大。1872 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茶叶逐渐依托轮船进行运输，大大缩短了运输周期。汉口祥发源的主要业务就是西茶帮茶叶的运输，其价格一般比招商局贵 5 分。<sup>②</sup> 由于招商局上层对西商茶帮信任的降低，祥发源与西茶帮因共同利益逐渐结合起来，汉口商界甚

<sup>①</sup>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法政卷上》，第 595—598 页。

<sup>②</sup>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 521 页。



至将祥发源称为西茶帮祥发源，<sup>①</sup> 足见其关系之亲密。

同治十二年（1873），徐润写给盛宣怀的信中提道“局中近事，装载西帮东口红茶、帽茶、砖茶水脚，已与祥发源立订合同，已着人到山西，一面赴两湖招揽，每年约有十八九万”。<sup>②</sup> 可见，最初的西茶运载，招商局是主角和发起人，周旋于祥发源、山西及两湖的西帮茶商之间，其一年的利润就有十八九万两之多。

### 3. 煤铁

绸布与茶叶外，祥发源还承担汉冶萍公司和开平煤矿之间的煤铁揽载业务。档案中保存了许多祥发源向汉冶萍公司催债以及二者之间就煤炭品质讨价还价的资料。如光绪二十二年（1901）五月三四日，祥发源就曾持铁政局公缄向汉冶萍公司索取开平焦炭的款项。<sup>③</sup> 该年六月三日，郑观应所在汉阳铁厂计划将四月十一日以后所买的焦炭与开平煤矿自行算账，应付水脚银也绕过祥发源。得知此消息后，祥发源更加坚定了追款决心，表示“不收到银，不回天津”。<sup>④</sup> 六月十四日，武昌蔡毅翁去电称“已告知祥发源无用焦炭八百吨需减价，五百吨需自行变价，余皆付还现款。如再来麻烦，请勿理他，方能就议。”<sup>⑤</sup>

尽管祥发源获得了开平煤矿的运载权，但在与汉冶萍公司的交易中经常被拖欠煤款，要求折价、减价，汉冶萍公司甚至企图绕开祥发源与开平煤矿直接交易。

### 4. 保险

保险业与航运业密切相关，外商建立的保险公司促进了外商航运业的发展，打击了我国民族航运企业的发展势头。因此，中国人积极谋划创办自己的保险公司，华商设立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义和保险行于1865年出现在上海。

祥发源经手的西茶运输最初都向安泰公司投保，而招商局汉口分局的西茶运输则向招商局旗下的仁和保险公司承保。<sup>⑥</sup> 因而在与招商局的竞争中，祥发源的保险金额远高于招商局。光绪元年（1875）由汉口装载西帮红茶至通州，每箱红

<sup>①</sup> 《汉口岭南会馆〈复上海广肇公所董事书〉》中说“至川帮揽载行及西茶帮，虽受旧人运动挽留，然川帮揽载行、怡和渝、招商渝、西茶帮祥发源与郑君非但世好，且有交情……”邓焕庄与郑观应都是广东人士，且都在上海当过洋行买办，所以称西茶帮祥发源与郑君有世好，且有交情。详见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917页。

<sup>②</sup> 刘志强编著《徐润年谱长编》，第267页。

<sup>③</sup> 陈旭麓、顾廷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04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111页。

<sup>⑤</sup> 同上书，第780页。

<sup>⑥</sup> 刘志强编著《徐润年谱长编》，第270页。

茶的费用，祥发源要比招商局高出5分。<sup>①</sup>这5分中，应该包括保险费。

费用的高昂，自然不利于业务的开展，如何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是祥发源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在邓瑞人担任经理时得以圆满解决。1906年，邓瑞人成立了上海宜安保险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主要经营水火险。1910年，邓瑞人又成立了上海仁安保险公司。

因为同属邓氏企业，祥发源揽载的商品都需投保邓氏名下的宜安与仁安两大保险公司。这两大保险公司办理理赔的速度和态度，不但影响着商家对保险公司的看法，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商家对祥发源的态度。

1907年8月11日，大福丸号被焚，美最利、广盛裕、广发仁、春生全、紫绮堂、保和隆等几家商号因在祥发源代理投保了宜安、仁安保险公司而得到迅速赔偿。出于对理赔速度和态度的充分认可和满意，这几家商号不但在《申报》上登文向祥发源致谢，而且盛赞祥发源资本充裕、经理人“得人办事有方”。<sup>②</sup>

因为对理赔的满意而乐意为保险公司免费宣传的，当然也不止美最利等6家商号。1915年8月12—14日的《申报》连续登载了一则宜安保险公司的新闻——6月16日晚，永和行装运匹头棉纱等货，驳船被颶风吹翻。因为在宜安公司投保有黄浦险（水险），邓瑞人十分爽快地将款项如数赔清，所以该行连续3日登报颂扬宜安保险公司诚实可靠。<sup>③</sup>

或许是因为信誉绝佳，永和号此后继续保持与邓瑞人的合作关系。1917年8月1—3日的《申报》中，又接连3天登载了永和号夸赞仁安保险公司赔款迅速的启示。该启示如下：

#### 仁安保险公司赔款迅速

启者。五月十四安平轮船中途失事，敝号代客在该公司投保货本元四千八百两。承该经理邓瑞人君将款如数赔到，足证信实昭著。

特此鸣谢

永和号启<sup>④</sup>

作为祥发源的经理人，邓瑞人不仅是一位社会名流，也是一位金融巨子，活

<sup>①</sup> 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21页。

<sup>②</sup> 《保险可靠》，《申报》（上海版），1907年10月24日。

<sup>③</sup> 《宜安保险公司诚实可靠》，《申报》（上海版）第15266号，1915年8月12日。

<sup>④</sup> 《仁安保险公司赔款迅速》，《申报》（上海版）第15971号，1917年8月1日。



跃在民国年间的舞台上。作为一位社会名流，他担任了一系列社会职务，如上海正心善堂董事<sup>①</sup>、中国公立医院名誉董事<sup>②</sup>、上海广肇公所议员<sup>③</sup>等。作为民国年间的金融巨子，邓瑞人还于1920年初受聘于英商保众保险公司华总经理。<sup>④</sup>为此，英商保众保险公司在《申报》（上海版）中将此消息连续登载近3个月，足见对邓氏的重视。此外，邓瑞人还在1927年创办国华银行、担任泰丰罐头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同德盐公司经理、十九路军参谋长及财务处长等职。因为邓氏的这些活动已与祥发源的业务无甚关系，故不赘述。

#### 四、余论

本文主要通过对文献的爬梳，厘清了清末民初祥发源商号的相关问题，并对祥发源的财东、商号性质、主要分号以及经营业务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祥发源是清末广东邓氏开设的报关行，总号设于上海，在天津、汉口、九江、广州、香港等地设有分号。祥发源主要经营货物揽载业务，后期也为邓氏名下的宜安、仁和两大保险公司代理保险业务，其揽载商品主要是绸布、茶叶、煤铁等。

作为近代民族企业的一员，祥发源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它不仅需要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还需要在外国在华资本主义企业和清末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便利和特权夹缝中周旋并求得发展。凭借各处分庄经理人的砥砺前行，祥发源从上海总号发展到拥有多处分庄，并最终成为当时报关行业中的佼佼者。

① 《善堂迁移》，《申报》（上海版），1905年9月2日。

② 《中国公立医院欢迎名誉董事》，《申报》（上海版），1914年5月9日。

③ 《广肇同乡公鉴》，《申报》（上海版），1918年12月8日。

④ 《英商保众保险公司启示》，《申报》（上海版）第16839号，1920年1月3日。